



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两状元一探花）。  
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 明清之际的 贵州书院

MINGQING ZHUI DE GUIZHOU SHUYUAN

庞思纯 郑文丰

◎ 编著



# 贵州书院

MINGQING ZHUI DE GUZHOU SHUYUAN

# 明清之际的

庞思纯 郑文丰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 / 庞思纯, 郑文丰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1-13800-2

I. ①明… II. ①庞… ②郑… III. ①书院 - 教育史 - 贵州 - 明清时代 IV. ①G649.29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8251号

## 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

---

庞思纯 郑文丰 编著

出版人 苏桦  
责任编辑 唐皓  
装帧设计 陈电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贵阳创新彩印厂  
规格 787×1092mm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221-13800-2  
定价 42.00元

# 前言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蜂起，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两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造就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固然与历史的际遇和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关，而贵州书院的应运而生，无疑对贵州的文教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建省兴学旨在驭民

明代之前，贵州文教不兴，从南宋的科举史中可看出，贵州跻身于功名者少得可怜，仅播州有八人中进士。朱元璋君临天下之后，把教育作为治国驭民的基本国策。他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对西南边陲的贵州，在加强政治、军事的同时，他下达的政令是“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之后，明王朝始终遵循这一既定国策，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的官员，大多恪尽职守，以推动贵州文教为己任。他们设学官，建文庙，办书院，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在此政策的感召下，各府、州、县、卫、司“徧（遍）立学校，作养人才”。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贬谪戍边的官员，亦把兴学育才作为职志，如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等人在贵州的文化建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正德年间，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并创办龙冈书院，旋即受聘主讲于贵阳的文明书院，开黔中讲学之风，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一所书院。据史籍所记，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



## 明代书院的兴起

明代的书院虽然隶属于官学，但在教学形式及内容上有别于官学。因为书院是学者讲课授业、著书立说、出版图书、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管理者称山长，由省府大吏或学政聘请的饱学之士担任。山长有权聘请著名学者讲学，内容广泛，讲课自由，学术气氛较为浓厚。与官学教育旨在科举不同，书院以传授知识为主，不以科举为务。由于书院遵循自由讲学的宗旨，无形中威胁到封建统治的官学体制和思想专制，从而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与极大恐惧。对统治者而言，万历至崇祯年间东林党、复社正是利用书院的讲堂自由讲学，抨击朝政，指斥“邪党”“阉党”，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国运危殆。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政权生存。基于以上考量，朝廷曾先后四次禁毁书院。在统治者的打压下，书院制度处于衰退状态。

自古以来，贵州文教落后，书院不兴。唐宋时期，湘黔边界的沿河鸾塘书院、竹溪胜院是贵州仅有的两所书院，然而好景不长，后来也渐寥落。到了明代弘治年间，贵州的学校教育不再由云南提学副使代管，受此鼓舞，一些热心本土教育的官员与人士趁势而起，纷纷办学，书院勃然兴起。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黄平士人周瑛在黄平州北龙渊池畔创办草庭书院，开黔中书院之先河。弘治十七年（公元1503年），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再建贵阳文明书院。在其后的百余年间，铜仁铜江书院、定番中峰书院、修文龙冈书院、黎平天香书院、平越石壁书院、贵阳阳明书院、正学书院、都匀鹤楼书院、南皋书院、镇远紫阳书院等继起，共有书院二十余所。这些书院大多分布在官学密集地区，集中在黔东北六府及黔中一线，这对活跃官学区的学术空气大有助益。

贵州书院的兴起和发展，都与王阳明在黔讲学及其学说在明代盛极一时有着密切关系。正德初年，王阳明在修文创建龙冈书院，聚众讲学，从学者三十余人。之后，“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而观如睹”。

王阳明的教学很有特色，形式灵活，与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学子可以自由发问，老师根据自己的见解即席回答。如果有异议，可辩论，可切磋。通过双向交流，密切了师生关系。在《示龙场诸生条》中，王阳明的教

育理念充分地显现出来，他对学子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史继忠先生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有如下评述：“龙冈书院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颇具独立思考、个性解放的特色，这在当时国内各书院中是十分突出的。”（《贵州通史·明代教育》359页）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因慕王阳明思想，邀其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为此，席书特挑选各府、州、县成绩优异的生员来书院学习，并“身率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与王阳明讨论身心之学，常至深夜，学生“环而观听”颇受教益。

王阳明辞世后，其“心学”风靡华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圣哲”之语。为纪念王阳明对贵州教育的贡献，贵州巡抚都御使王杏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建阳明书院，贵州提学副使——王阳明弟子蒋信于七年后（公元1542年）建正学书院。蒋信的继任者徐樾，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在黔期间，“讲明心学，陶镕士类”，不遗余力。黔中大吏亦不甘人后，拨款修葺修文阳明洞及王文成公祠，之后又在贵阳修建阳明祠。

贵阳系黔中首府，有“领袖全黔”的地位。文明书院的建立，吹响了贵州文教振兴的号角，在文明书院的引领下，全省各地官员士绅乘势而起，纷纷建立书院，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据史册所载，从明初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两百余年间，在华夏的科举场上，贵州士人书写了一百一十一名进士和千余名举人的好成绩。这些进士和举人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优良之族”及其后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明代大兴文教的大环境中，加之书院的熏陶，他们发愤图强，走出大山，在科举场上与中原士人互争雄长。《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序》对此有如下评价：“黔自建省以来，名德硕彦接踵云兴。或以经济，或以勋业，或以学问，或以品概，固已彪炳当世，卓犖千秋矣！以与中州相较，未遑多让，孰谓黔瘠而无人哉。”

## 清代书院的发展与消亡

清朝入主中国后，汉族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息。为了防范明朝遗民利用书院宣传反清思想，清廷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顺治九年（公元1652



年），清廷明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贵州仅保留明代书院四所，它们是思南府的大中书院、为仁书院，平越府的溥仁书院及贵阳府的阳明书院。据康熙年间统计：当时贵州共建各级官学六十九所，其中府学十四所，厅学八所，县学三十四所，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及自信心的加强，清廷逐渐认识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

到了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廷下令在各省设立书院，经费由朝廷拨给，责令各省督抚“有化导士子之职”，“宜殚心奉行”，时刻牢记“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流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省官员闻风而起，视兴办书院为“人才之藪，教化之源”。然而清廷并未放松对书院思想领域的控制，它的手段是：逐步使书院官学化，使之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如书院的主持人（乾隆以前称山长，之后称院长）、设置、办学经费及生徒均由各级官府批准。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廷明确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成课，使贯通经史。”（《遵义府志》卷二十四）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清廷又对书院生员课程内容作出以下规定：“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遵义府志》卷二十四）

清代书院教学以考课为主。书院的学生，就是官学的生员。他们平时以自学为主，定期参加考课，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考课每月两次，全年十六次（因每年开课八个月）。据史料所载，黎平府黎阳书院规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二开学，十一月六日封课。生员每日上午背诵诗文和讲解四书五经经义，下午讲解诗法。清明回乡扫墓，八月回家参加收割，各放假五至七日，可以免课，其余月份的初二和十六日举行月课，每次课考作文一篇，诗一篇。课考后按成绩排定名次，发榜公布。

考课是书院的主要形式，但不少书院沿袭了明代王阳明、邹元标的讲学之风。如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陈锐，乾隆年间担任山长的陈法、张甄陶、艾茂，以及乾嘉年间主持贵山书院的何泌、翟翔时，光绪年间的贵州学政严修，都以“躬为训课”、为学子释疑解惑而著称。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贵州书院人才辈出，世代不衰，为科举制度输送了大批人才，并在传播传统文化、培养人才、繁荣学术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虽然官府对各地书院控制很严，书院自身也是重考课而轻讲学，然而书院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文化的传播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贵州的部分书院，仍沿袭明代王阳明、邹元标的讲学之风，比较重视山长、主讲的选聘。加之聘请省内外博学鸿儒到此讲学，使书院的教学质量明显高于府学、县学。如贵州郎岱设立书院后，“生徒常住数十人，弦诵之声不绝”，自此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又如贵阳的贵山书院，生徒常在百名以上，最多时达二百余人，许多博学鸿儒在此讲学。如清初理学家陈法，在贵山书院执教二十年。之后的名士艾茂、何泌、翟翔时等，都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职志，对贵山书院“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甲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做出了贡献。

贵山书院毕业的学生中亦不乏俊杰之士，如嘉庆年间被誉为“殿上虎”的谏官花杰，咸丰、同治年间著名汉学家傅寿彤，以及“大魁天下”被称为“滇黔以状元及第夺魁第一人”的赵以炯等。又如贵阳学古书院，光绪初年改为正习书院后，贵州学政严修又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将其易名经世学堂，以此进行贵州教育改革。经世学堂不仅是贵州兴办近代教育的开端，亦是国内最先改革书院的典范。该学堂为贵州乃至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并使之成为清末民初的政界、文坛及学界的中坚力量。

据史料所载：清代贵州共有书院一百三十三所，其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就有一百余所。较之宋代的一所和明代的二十一所，清代贵州书院发展之快，实在惊人。值得一提的是，以前文教未兴之地或新建置的府、州及直隶厅也建起了书院。如新建置的大定府建有十一所，兴义府建有十所，松桃直隶厅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道光及光绪年间先后建起书院三所。过去被视为“王化未及”的





“千里苗疆”，改土归流后，亦先后在罗斛厅、长寨厅、郎岱厅、归化厅、永丰州、古州厅、永从县、八寨厅、丹江厅、台拱厅建立书院。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经过血腥战火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大多遭受焚毁。战后有的得以恢复和重建，有的就此消失。光绪年间，贵州虽然又新建一些书院，但数量少、规模小。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王朝颁布兴学诏书，贵州的书院随后改为大、中、小学堂。自此，书院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 目 录

前言	01
<b>明代贵州的第一所书院——草庭书院</b>	01
黔东南首位进士周瑛与草庭书院	02
<b>首代王门弟子的孕育地——文明书院</b>	04
新建文明书院记	05
重建文明书院记	06
毛科、席书接力催生黔中王学圣地	07
“修一院、筵一人”以兴文教的毛科	08
接力毛科兴王学的席书	11
王学弟子蒋信重振书院教化	13
<b>王阳明亲创的儒学道场——龙冈书院</b>	16
示龙场诸生教条	16
将明代贵州书院教育引向巅峰的王阳明	18
黔中最早聆听阳明教诲的汤昇	22
<b>天下所建最早的王门书院——阳明书院</b>	26
阳明书院碑记	27
入黔官员王杏以阳明为楷模宏文教	28
“贵阳名士”马廷锡与阳明书院	30

<b>传播阳明心学的清平圣地——学孔书院</b>	32
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	32
名臣大儒——孙应鳌	34
<b>思南文化的学音之地——为仁、中和两书院</b>	40
中朝理学名臣之李渭	41
<b>都匀之学的源头活水——南皋书院</b>	44
南皋书院记	45
邹元标与陈尚象：师生二人以阳明为师，兴教化、扬正气	46
南皋书院最有名的学子陶廷杰	52
<b>清代西南地区书院之最——贵山书院</b>	56
重修贵山书院记	58
“三先生”与“二山长”	59
兴书院、识黔才的洪亮吉	62
惠泽黔中士林的程恩泽	65
推行黔地书院改革的贺长龄	69
贵州文状元——赵以炯	72
<b>晚清书院新教育改革的先驱——学古书院</b>	76
学古书院肄业条约	77
“二百年无此文宗”的严修改革学古书院	80
西南之雄雷廷珍实践教育理念	86
李端棻：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行者	90
唐尔镛与任可澄：学古书院走出的贵州立宪派核心人物	96
办学始、著述终的任可澄	99
周恭寿与黄干夫：学古书院培育的贵州教育界领军人物	105
达德学堂创办人黄干夫是黔中新思想的“播火者”	110

<b>沙滩文化孵化地——湘川书院</b>	113
建修湘川书院记	114
乾嘉学派的贵州传人莫与俦	115
“黔中文坛祭酒”——莫庭芝	120
<b>遵义沙滩文化的传习所——启秀书院</b>	122
启秀书院记	122
重修启秀书院记	123
沙滩文化的领军人物郑珍	124
黔中宿学——莫友芝	131
黔东冠鸡——胡长新	140
<b>黔西南影响最大的书院——笔山书院</b>	145
兴义笔山书院历届山长姓名录	146
刘统之与笔山书院	147
半生为教、一生为艺的姚华	151
笔山书院著名学子王伯群的革命与教育之路	156
<b>文化武化轮流转的场所——铜江书院</b>	165
铜江书院	166
改修铜江书院记	167
铜江才俊徐穆与徐如澍	168
“颐和园”匾额书法作者严寅亮与铜江书院	172
<b>大定府属书院之冠——万松书院</b>	177
大定万松书院记	179
重修万松书院记	179
“事事皆以培风化为先务”的黄宅中	180
“以一省文献自任”的“一经教授”傅汝怀	184
乌蒙奇才徐礼和	186

<b>毕节文化荟萃之地——松山书院</b>	189
教人先品行后文艺的教育家陈庚	189
清廉兼具诗才的路璜父子	192
“不栉进士”的贵州女诗人周婉如	195
<b>安顺书院的发展界点——凤仪书院</b>	199
凤仪书院田土并章程碑记	200
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	202
周之冕与陈凤仪：凤仪书院两名师	207
黄桂盥、何威凤：凤仪书院双杰	209
<b>黔东门户的文化门户——文明书院</b>	216
治世能臣——谭钧培	217
贺绪蕃与文明书院	222
<b>瓮安文音教化之地——旗山书院</b>	227
登楼共指状元旗	227
“黔人两大诗宗”之犹法贤	230
“黔人两大诗宗”之傅玉书	231
<b>明清贵州书院表</b>	237
书院知识简介	250
<b>后记</b>	256

“草庭书院”系明嘉靖年间黄平人周瑛所建。嘉庆《黄平州志·古建》记载，草庭书院为周瑛读书处。

《黄平县志》（1993年版）上说，周瑛“捐家产，于城北龙渊池畔风衣胜地，创办草庭书院，又修建学宫，协办兴隆卫学”。

《镇远府志》载：周瑛，字廷润，兴隆卫人。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举人。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进士。周性疏敏，多才学，以进士秋官主事，升外郎，出知临安、衡州二郡，转太仆卿，参广东省政，升广西布政史，剔历中外，德政洋溢。已而引年，优游林泉，多咏吟，尝出资修学，所著《兴隆卫志》二卷。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周瑛辞官归里，倾心地方教育，捐出全部家产在黄平卫城北龙洞旁创办了“草庭书院”。此处青山秀丽，景色宜人，院舍完善，宁静古雅，是明代贵州最早的书院。周瑛遵循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所收学子，不分官民，不论贵贱，但须有志于学，品德端方。在书院教学上，周瑛倾其所学，悉心教导。与此同时，为拓宽学子视野，周瑛邀请地方博学鸿儒到书院讲学，讲授儒家经典、史学巨著、唐宋诗词、宋明理学……旨在培养学子独立思考能力和认知能力。周瑛主持书院十年，为黄平及黔东培养不少有识之士和杰出人才，草庭书院之名不胫而走，成为黔东学风纯正，学子勤勉向学的最有影响的学府。之后，草庭书院在周瑛之子周希廉的主持下，特邀请途经黄平赴江西庐陵任知县的明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阳明到书院讲学，阳明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学子，这些自称“阳明学子”中的不少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均有所建树。

据史册所载，自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周瑛创办草庭书院，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四百余年间，黄平中进士的有二十二人，举人数以百计。如此斐然之成绩，与周瑛对地方文教的贡献及影响不无关系。



## 黔东南首位进士周瑛与草庭书院

“黄平在黔为文物声名之地，科名辈出，甲于他郡。”贵州史志曾有是说。翻阅明清教育史，黄平果然不同凡响，人才辈出，世代不衰，涌现出二十二名进士和二百五十名举人，陶冶出称誉黔中、扬名华夏的周瑛、解立敬、王耘、朱定元、石赞清和乐嘉藻等才俊。这种佳绩，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钦佩不已。

周瑛，字廷润，号涧松，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出生于兴隆卫（黄平旧名）一军人家庭。周瑛祖籍江西临川，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其祖父周庸二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出征云南，留守兴隆。周瑛自幼聪颖好学，稍长便进入刚成立不久的兴隆儒学就读。时值朝廷大兴儒学，作养人才，以此期望“移风善俗”“敷训导民”。周瑛家道中落，贫穷困窘，为改变家中的困境，他选择“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从小勤奋苦读，志在功名。补卫学生后，更能笃志于学。由于意识到家乡闭塞落后，难以接触到良师益友，于是他背着粮食，远赴四川泸州，与当地的饱学之士切磋学问、精研经史、谈文论艺、诗文唱和，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广阔，学识日见深厚。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二十一岁的周瑛乡试中举，四年后再中进士，成为黔东南境内第一名进士。周瑛金榜题名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黔东南历史上无进士的局面，揭开了该地区文化勃兴的序幕，同时为广大士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带动了整个地区的文教事业。



周瑛像

周瑛青年入宦，初任刑部侍郎，他踌躇满志，意欲大展宏图，施展一生的抱负。天顺年间，周瑛先后出任临安、衡州太守及太仆卿；成化年间中期，升任广东左参政，续迁广西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辞官归里。周瑛为官三十余载，本着为国尽忠、为政以德的宗旨，治理地方政务，力求清正廉洁、保民恤民，其大公无私，心怀坦荡，深得任所民众的好评和赞誉。在中原士人对贵州怀着偏见的情况下，周瑛的为政作风、道德风尚及人格魅力，无疑促进了他们

对贵州士人的重新认识。

回到故乡后。周瑛痛感桑梓文教之落后，于是捐资办学，先在城北风景胜地龙渊池畔创办了明代贵州第一所书院——草庭书院。现存有“草庭书院”四字摩崖。摩崖镌刻于岩壁上，横行排列，长方形底，底面宽1.36米，高0.69米，上沿距崖1.5米，下沿距崖麓



摩崖石刻——草庭书院

18米，字为楷书，体兼颜、柳，结构谨严，笔力劲健，字高0.6米，宽0.31米。据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载，“草庭书院”系明嘉靖年间所刻。嘉庆《黄平州志·古建》记载，草庭书院为周瑛读书处。摩崖为后学追念周瑛所刻。

据史载，草庭书院只有茅屋三五间，但因有山有水，加之其景“林间茅屋掩荆扉，柳媚桃夭乳燕飞”，是个读书的好去所。周瑛主持书院十余年，激励学子上进，邻近州县来黄平就学的颇多。后周瑛之子周希廉在书院主讲期间，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由修文奉调江西庐陵任知县路经黄平，受邀到草庭书院讲学，草庭书院由此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草庭书院出去的学生都自称“阳明子弟”。

周瑛后来协办兴隆卫学，并大力倡导尊师重教之风，以激励生员勤奋苦读。周瑛主讲草庭书院十余年，由于教学有方、学识渊博、人品高尚，深受教师、学生钦服。邻近州县闻其大名，求学者众多，云从景从，从而使草庭书院及周瑛之名远播至黔东南地区。

周瑛的办学不仅发展了地方教育，而且对地方文教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册记载，自周瑛创办草庭书院至清末废除科举的四百余年间，仅黄平一地就产生了二十二名进士（一说二十九名）、举人二百五十人。史称黄平“科甲辈出，甲于他乡”，乃源于周瑛倡导的尊师重教的优良学风。由此可见周瑛对地方文教的重大贡献。

在主持草庭书院期间，周瑛撰写了兴隆卫第一部方志——《兴隆卫志》，又将为官以来四十余年所著诗文手稿总近千篇首，手自校录，编辑成《草庭类稿》一书，共七十二卷，其书目载入《明史·艺文志》。





## 首代王门弟子的孕育地——文明书院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元朝黄庆年间是指一三一二年至一三一三年，文明书院可谓是贵阳史上最早的书院。书院落成后一百七十余年至明弘治朝，因房屋腐朽而废弃。

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毛科出任贵州提学副使，莅任后，痛感贵州文教不兴、士子浅陋，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贵州“建书院，择师儒以陶熔士子”。其想法得到巡抚洪钟、巡按王韶的认同后，毛科在元代顺元路儒学故址，即贵阳忠烈桥西购得胡指挥废宅一所，在此复建文明书院。重建后的文明书院是明代贵州第二所书院。

复建工作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十月始，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七月完工，历时十九个月。建成后的书院，大门门额镌刻阴文“文明书院”四个大字，门内有文会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之后有四斋，以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之才学德识命名为“颜乐”“曾唯”“思忧”“孟辩”，以此期望学子“企慕乎群贤，进修践履，而不为他岐之惑”。斋门之上有戟门，门之内有左右庑，上有先圣庙，庙后设师文、学孔二斋。要求学子师法其中一位圣人，“操存涵养，而不为利禄之所动”。入学的二百余名学子，皆系选拔的聪俊有志者，书院特“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斋之上有乐育轩，毛科“亦时登此轩，诱掖奖劝，而督率之，务底有成，以续斯道之传”。

在文明书院的历史中，最光辉的篇章莫过于明代哲人王阳明在这里传播“知行合一”思想，孕育了第一代“王学”弟子。据《王文成公年谱》云：“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先生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即文明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席书字）提督问朱（熹）陆（九渊）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副宪（毛科）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